

四川省隆昌县云顶郭氏札记

— 清末民国初期的乡绅

日本·西川正夫教授 原著
(中文译本)



1999年8月印行
(中国成都)

7252
0754

日本前金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 教授 西川正夫 原著
中国前西南民族学院国际关系 讲师 牟万雄 移译
中国前华西医科大学医学史 教授 郭成坛 校勘

四川省隆昌县云顶郭氏札记

——清末民国初期的乡绅

南充医学院图书馆 惠存



贈

1999.1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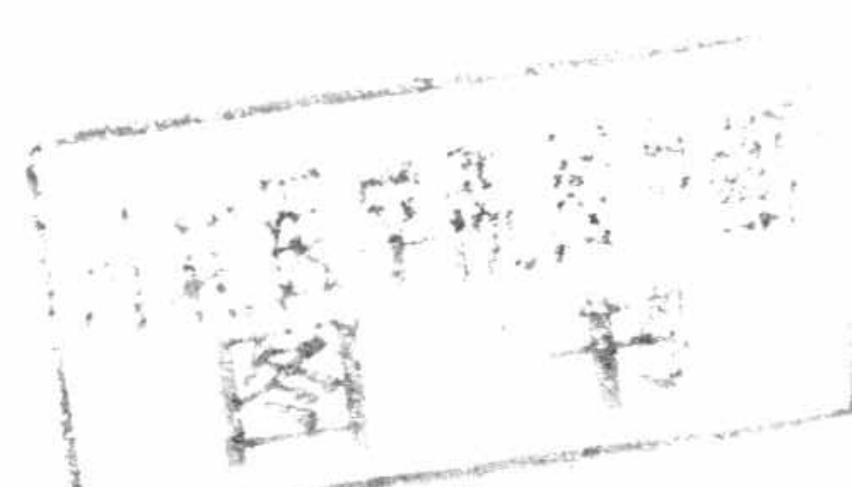
A0056153

本书咨询地址：

中国四川成都市华西医大高知楼12-06郭成坛

电话：(028)5501910

邮编：610041



235963

引言

这是一本以四川隆昌云顶郭氏旧族谱为依据,参考了大量有关文件史料,并以云顶郭氏宗族整体发展史为蓝本写成的别居一格的云顶郭氏新型族谱。

族谱学是研究人类宗族世系历史的一门学问。中国有,世界各国也有。中国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编制的宗谱(简称“旧族谱”),基本上是具有各该社会的阶段特征的宗族志。它记录宗族的祖支世系的动向、演变、迁徙以及显著人物的简历、活动和贡献等;而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新族谱至今尚未问世。但为期亦不会太远,我想在 21 世纪初将会出现吧。

就目前族谱学的进展而言,作为一种“家族志”的形式和内容的旧族谱,由于它本身形式和内容的局限,必然它将逐步发展为一种由“志”到“志、史结合”的新形式。说不定也许就是本书作者西川正夫所用

的“札记”型吧。

“札记”是一种文体，它把真实史料如实不加任何粉饰地记录下来（“志”），然后，以“志”为根据，与有关资料揉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和评议；从中发现至关重要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发展和人如何推动社会进步的规律，使子孙后代有所恨、有所爱和有所依从。因之，现代新族谱在体例上非首先打破单纯“志”的记载范畴不可。只有如此，才可走向“志与史的结合”的自由广阔视野。“札记”就是一种现代新型族谱的特殊体例结构吧。或者，我们也可把这种编谱方法叫做“史志结合法”或“西川正夫法”，因为迄今为止，还只有他是用这种方法进行撰叙族谱的。

中国族谱学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文化史的一个部份。它的起源约在公元前 17 世纪的殷商奴隶制时期（据殷墟甲骨文《家谱刻辞》），距今已有三、四千年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特重门第，有司选举，必稽

谱牒，族谱学随成为地主官僚保持门阀的工具。明清尊崇儒学，提倡科举取士，编修世族家谱成风，宗族世谱已属世族缙绅的一种专利。清末民初，由于外来列强侵略，中国由长期封建社会转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农民斗争和知识分子的觉醒献身革命汇成一股洪流，震撼和动摇了传统政治基础和传统世界观，正如西川正夫在他的论文《四川保路运动前夜的社会状况》中所说：“这一时期，四川农民运动最重要的特征是运动的人民性和人民战争”。这时期爆发的李蓝起义、余栋臣起义等农民运动决不可漠然视之，它们有形无形、直接间接震撼和摧跨着满清的城乡统治，并且促使旧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等级关系、伦常道德和社会风尚加速变化。他们的斗争口号，由初期策略性的“顺清灭洋”，后来变成了“灭清剿洋兴汉”。西川正夫反映在本书中的郭氏家族这一时期的兴衰动态，使我们觉得一个小小的云顶寨正是整个多灾多难的中国的一个缩影。西川正夫以敏锐的

历史学家的智慧和洞察力,通过云顶郭氏宗族的动态表现,如实和重点地反映了这一世族全盘的历史真象。比如土地的高度的集中化,云顶郭氏一族清末时的产业高达七万七千余石,田产面复盖了云顶、石鹅、胡家、傅家、响石各乡及邻县的太和、代寺等地。总田产的约四成,计三万余石归^⑯人镛所有。随之而来的地主土地剥削下的农民的惨状自不待言,只要看看地主^⑯祖椿,字茂宣号慎修如何对待佃农郑巩庭就可知道了。至于郭氏宗族的知识阶层,当国家存亡之秋不惜牺牲家业田产甚至身家性命,投身于中国历次革命斗争和反帝斗争的更是大有人在。如^⑯祖楷(书池)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力支援革命党枪支弹药,曾任隆昌军政府司令。其子^⑰成炆(蔚华)于1905年参加中山先生建立的同盟会,民国成立,成炆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并全力支援护法北伐。又如,^⑮光皤(翰芳)长子^⑯祖勘与傅双无、吴玉章等办《赤心评论》宣扬共产主义,并共同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又如^⑰士杰、^⑯

成士同(含光)均系早期中国共产党员，二人先后皆牺牲于 1925~27 中国大革命的血泊中；其它如著名学者、新闻学家②成爽(步陶)，著名数学家、教育家③士元(坚白)的事绩，著者记载尤详。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云顶郭氏子孙们的名字，书中均行记载。……本书副题“清末民初的乡绅”，实际上书中的指向决不是几个乡绅，而是云顶郭氏家族的整体的全面的历史。

西川正夫，1931 年生，日本滋贺县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前金泽大学文学部历史学教授。是一位研究中国四川清末民初史的专家。

1992 年 2 月，本书刚出不久，我即得到著者寄我的一本。很惭愧当时日文我仅速成了三个月，他的书只能说大致可以看懂。看完后，我十分佩服著者能以一位异国学者的笔写出连我们中国人都还不曾写的一本打破了旧家谱僵死格局的新的云顶郭氏族谱。

从此,我和西川正夫建立了一种学术上的友谊,屈指已七年了。1996年,我以偶然机会又得识西南民族学院牟万雄君,他是该院国际关系讲师,懂日文。他应我请求,欣然允诺将本书译成中文。译文于1997年完成。我对照原文又将原书通读一遍,我认为译文通达流利、信实可靠,预备出版。后因故搁浅,一搁就是三年。今年春,我又萌发了出版的念头。随去信征询西川正夫意见,他立即复函赞同并写了一篇简要的《后记》,这使我十分高兴。但是,出版前,我们对译文仍不放心,又将全部译稿寄给西川正夫教授,请他详阅并改正;他在六十八岁高龄和溽暑炎热下,不辞辛苦劳累,迅速认真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这种负责精神使我们衷心钦佩和感谢!于是这本小书就在我们协同努力下出版了。

我满怀热情地盼望四川隆昌云顶郭氏宗族的后代子孙们,以及所有对云顶郭氏宗族历史和发展感兴趣的同志们一读此书!并且希望能在这本小书的鼓

励下，在保存传统族谱的优特点的基础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自己能写出一本符合时代要求的云顶郭氏新族谱，这也许就是我们要出版本书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最后，重复一句：本书因所采摘材料广泛及出版匆匆，并非无可争议之处，尚盼读者多提意见，则不仅使著、译、校者受益，使未来隆昌云顶郭氏新族谱的编写工作受益，也使中国谱牒学的发展受益。

郭成圩

1999年5月8日，于华西医大高知楼，
是日适为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纪念日。

目 次

- 引 言(1—7页)
- 正 文(1—81)
- 一、四川隆昌云顶寨的直接外在环境—四川隆昌(1—6)
- 二、四川隆昌云顶寨郭氏宗族概况(6—10)
- 三、四川隆昌云顶寨郭氏有力各支派(10—57)
- I. 时亮祖支(11)
- II. 运暄祖支(11—12)
- III. 懇相祖支·懇宏祖支(12—15)
- IV. 世宏祖支(15—19)
- V. 鸣泰祖支(19—22)
- VI. 承义祖支(23—27)
- VII. 可忠祖支(27—53)
- 郭氏各祖支综述(53—57)
- 四、四川隆昌云顶寨郭氏族谱的修订(57—60)
- 注释及补注(61—81)
- 后记(原文及译文)(1—3)

(注意：正文内各标题文字说明系校勘者所加)

附录(依文次排列)(1—15)

1. 第Ⅰ图:隆昌郭氏明代世系表略图(1)
2. 隆昌云顶寨示意图(2)
3. 第Ⅱ图:运煊祖支世系表略图(3)
4. 第Ⅲ图:懋相祖支·懋宏祖支世系表略图(4)
5. 第Ⅳ图:世宏祖支世系表略图(5)
6. 第Ⅴ图:鸣泰祖支世系表略图(6)
7. 第Ⅵ图:承义祖支世系表略图(7)
8. 第Ⅶ图:可忠祖支世系表略图(8)
9. 第Ⅷ图:郭祖棻·祖清家族关系略图(9)
10. 第Ⅰ表:隆昌郭氏第十世祖支别族人数(10)
11. 第Ⅱ表:《族谱》传记登载者支派别人数(男、女)(11)
12. 第Ⅲ表:郭氏一族女性(女,夫人)“学历、经历(简历)”记载者数(11)
- 13.《族谱》传记登载族人表(12—13)
- 14.《族谱》传记登载族人(女)表(14)
15. 兴国中学董事会成员表(15)

—

隆昌县县城位于成都东南约一八〇公里，重庆西南约一二〇公里，地处东大路（巴县大路）要冲^[1]沿此路从成都出发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到达隆昌。再由此经荣昌、永川到达重庆。隆昌与内江、荣昌、泸县、富顺四县相邻。民国年间户数约为七万三千户，人口约为三十四万八千人^[2]。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时，四川全省人口密度一五九点六人，而隆昌县的人口密度为四一四点二人^[3]，在四川一三五个县中名列第十二位，当时属较发达地区。在清代，隆昌县的“正粮”（地丁银）为六七四六两^[4]，隆昌县知县系“冲·难两字中缺”^[5]，民国时隆昌县的等级为二等县^[6]。

清末民初，廖新曾记载道：

“隆昌是四川省有名的产粮区之一。除粮食经济作物外，并以盛产生猪、猪鬃、夏布、煤炭、天然气著名”^[7]。

隆昌县也向县外输出米谷、甘蔗、红苕等农产品，但其特产首推夏布。神田正雄所著的《四川省综览》（1936）一书中也曾载道：

“麻布是四川省大宗物产之一。其产地以隆昌县为主，隆昌县每年出产麻布达四、五十万匹，占全省麻布总额的百分之六十，隆昌直接间接以麻布生产为生者，几乎占全县人口之半。此地麻布以前主要销往朝鲜，满州事件（指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一译者）后销路几乎断绝，隆昌人失业率众多。麻布贸易渐渐趋势微。”

隆昌生产麻布所用之白麻十有八、九仰仗外县供给，而主要供给地是琪（应为珙，以下（ ）内为引用者注）县的落（洛）表场。高县、筠连等地次之，而江津、綦江等地又次之，每年白

麻需求量以前常达十万担”^[8]。

道光三年(1823)重修的《(道光)隆昌县志》^[9]第三八卷中关于物产的部分有这样的记载：

“麻布，一名下布(夏布)，隆昌妇女多勤绩成布，细密轻软，夏日服之却暑迎凉。今山西、陕西等省往往来隆，兴贩获利。棉布，棉花春种秋拾，纺织成布，隆邑人多贩往云南、贵州等省发买，其利与麻布同。”

同书的第三十九卷中关于风俗有这样的记载：“女工：女有余(以外的一译者)布，以棉花、苎麻为之。”

道光初年，据说隆昌的夏布已由山、陕西省商人运往省外各地销售。《四川省之夏布》一书记载道：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在成都贩卖“花边”(Lace类?)的“山西行商沅(阮)吉生”于旅途中在隆昌一家旅店中看见了夏布，于是便了解到这是隆昌的产品，他向一位姓李的机匠打听情况后，便拿出银两托李姓机匠代购夏布。第二年，夏布便被贩至华北各省，这就是四川夏布行销省外的开端，即所谓“遂开川夏布出口之权舆。”夏布的发展时期是在道光、咸丰年间，民国七年以后逐渐进入兴盛时期^[10]。如前所述，山西、陕西商人在道光初年已经来到隆昌买夏布，因此，夏布的输出可以追溯到道光、咸丰年间以前。随着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北京商人——即所谓：“京西帮”对夏布的买卖，夏布输出便在从道光年间到同治年间这段时间里正式开始，这是自古相传：“山西行商阮吉生”的故事所反映的真正史实吧。钟辉武也在《隆昌夏布简史》^[11]中记载，明末四川在因战乱而人口剧减，清初，大量湖广移民来川。湖南浏阳、江西万载、广东潮州等地的种麻、绩麻、织布方面的技术在此期间也传入四川。他认为在一八五

○年前后，夏布已形成了商品性生产。然而，在夏布生产的三个阶段——绩麻、织布、精制过程中，隆昌擅长绩麻和织布，精制则为水质得天独厚的邻县荣昌所擅长^[12]。绩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是隆昌农家妇女从事的家庭副业。绩麻者一家一人甚至多达三、四人，全隆昌总共有两万户，三万四千妇女先后曾操此业^[13]，这个数目相当于全隆昌农户五万户总数^[14]的四成。神田正雄在前述著作中写道：“隆昌所需白麻十之八九仰仗外县供给。”光绪三十二年（1906）修订的《隆昌县乡土志》^[15]中记载道：“麻宜织布，产自隆昌及荣昌者，皮薄光润，推为上品”（东乡乡土志、物产、植物）。此记载一方面强调了隆昌是优质麻的特产地；同时另一方面该书又记载：“麻自珙县、筠连、叙永、安居等处水陆并运贩至本境行销，此非本境产物，每年约银三十余万两。”（东乡乡土志、商务，本境所产之物）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迟至光绪年间，隆昌县出现了农民将自家所产之麻，以及购入以补不足之麻合在一起，或者完全从外地将麻购入，从事商品性的绩麻、织布生产这种现象。在三十年代，从事夏布生产的专业机户和兼业农家的情况，《四川之夏布》（1936）一书中曾载道：“隆昌：隆昌纵横九十里，除西乡机房较少外，轧轧机声，随处可闻，分布最为普遍，约有七百家。”该书还记载这些机户拥有当地木工每天加工制造的织机数量最低为一台，最高为十二台（一般机户拥有量为三、四台）；全隆昌前后有二二〇〇台织机开动过^[16]。这是已过最盛期的一九三〇年代的数字。《四川经济参考资料》（1939）记载：

“旧日发达时，每家机数多至三十部，近则最多‘七、八’部，少则‘二、三’，暂维现状而已^[17]。”

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的最盛期，即二十年代，织机多达三十台的机户也是有的。当时隆昌的织机台数，以织布为副业的农家数，推算而来皆超过前述三十年代的数字。吕平登在《四川农村经济》(1936)中记载，关于四川特有农产品的输出，大致如下所述。亦即输出从清末开始，尤其在民国五年(1916)以后到世界经济大危机为止的十四年间输出急剧增长，“副土产的农业经营”也逐渐繁荣起来，由此带来了“四川特殊经济区”(如糖区的资、内，盐区的自贡，麻产区的隆昌、荣昌，丝蜡产区的乐山；烟叶产区的郫县、金堂、什邡；酒产区的绵、彭；茶产区的雅安)的发展。这种繁荣促进了四川社会中“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农村社会经济上，为使农村商品，极度加入商品化流通过程，货币经济发展，颇足调剂农民经营之损失。^[18]然而，吕平登指出，隆昌这种特有的农作物与高度发达的外国产品相比显得十分落后，必然遭到被淘汰的命运，加上发生了世界经济大危机，四川特有农产品的输出随之急剧减少。这种产品输出的减少，加速了“中产阶段”的破产，加剧了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加速了“工人”失业人数的增加，加速了金融的停滞以及购买力的低下。吕平登进一步强调，四川农村社会中“商品农产经营”的减少，“中农、富农”的贫困化，“农民经营”的损失无法补填和调整，从而带来了农民生活的困难。他还论述了清末以(降)后特产物输出的兴盛以及以一九三〇年为界线，输出不振对四川社会产生的影响^[19]。然而，关于清末以后给隆昌夏布生产的发展以及衰退带来的农民阶层分化的实际情况之分析，还无人探索过。

仅次于夏布的隆昌特产物即是猪鬃，尤以白猪鬃最为有

名。吕平登在前书《四川农村经济》中写道：

“猪鬃为四川出口大宗，输出品上占第五位。四川为中国九大猪鬃产区之一。川鬃品质为世界第一，获得国际荣誉^[20]。中国国际贸易协会所编《猪鬃—Bristle》一书有这样的记载：“最优良的白猪鬃产于沱江流域的隆昌，此地被称之为四川的白鬃地带，该产品经泸州而运往外地^[21]”。该书指出，隆昌一带是著名的白猪鬃产地。据该书记载，在咸丰年间（1851—1861）广东商人开始将猪鬃输往广东。1890年汉阳帮，其后是日本的商社开始在重庆收集猪鬃，并设立加工工场。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猪鬃输出兴盛时期，仅四川省所产白猪鬃据说即达三千多担^[22]。隆昌经营猪鬃贸易的“华美字号”的经理吴叔文的侄子吴荫秋在《建国前隆昌猪鬃收购和运销概况》。一书中记载道：“隆昌、荣昌、泸州为白鬃特产地，三地年产约千担，隆昌年产约四百担”^[23]。与夏布贸易相比，隆昌的猪鬃贸易的发展稍迟一些。据从19世纪末猪鬃贸易开始到其兴盛期间，推测起来也在不少程度上影响着养猪的农家的经济。

另外，隆昌地处被称之为：“嘉、沱下游间煤田”的矿脉上。荣昌、隆昌、泸州、富顺一带地下藏有煤炭，而且也是煤产地^[24]。周开庆在《四川经济志》（1972）一书中记载：

“本县（隆昌）煤厂，至抗战末期，约有六七十家。其中除石燕、义大两厂用机器开采外，其余均属土法。全县每年产量约十余万吨，运销椑木镇、内江县城、自流井及毗连富顺之迴龙、代寺各乡者，约占十分之七，本县境内消耗者约占十分之三”^[25]。

据该书记载，此地生产煤炭，大半作为制盐、制糖的燃料

而输出。前面提到的《(道光)隆昌县志》第三九卷,关于风俗的章节也这样记载道:

“工役:贫民无恒产者挑煤多半是生涯”,这也就是说,当时没有恒产的贫民多半以挑煤维持生计。

二

本书所载之隆昌郭氏家族是于明代洪武四年(1371)时,从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由始祖郭孟四率领一家老小,迁到隆昌县南部的云顶山麓(当时属于富顺县赵阳乡)。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修订族谱时,历经二十九代,族人大约二千五百人。到1989年的今天,族人不下五千人。^[26]

孟四之孙,即第三世祖③廉,(略记为③廉,以下各代皆依此略记),早在永乐三年(1405)就中了举人,永乐七年(1409)进士及第,后任职云南道监察御史。以后,仅仅在明代,该家族就举人、进士辈出,共达十一名之多。即:④应诚(举人1435),④维新(举人1441),⑧尚伯(举人1549),⑧元柱(举人1570,进士1577),⑨庆年(举人1585,进士1592),⑨继开(举人1612,进士1616),③继芳(举人1582),⑩时亮(举人1615),⑩运煊(举人1639),⑪之范(举人1627,⑩可忠之子)。共计举人十一名,(进士四名)辈出。

隆昌郭氏家族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⑩光遜等续修了《郭氏族谱》^[27](以下,略记为《族谱》)。该族谱以②宪祖·②廉祖为祖房的房祖,把第四代到第十代分为两祖房,即③宪祖房和③廉祖房。第十代到第十四代,以第十世祖为祖支的